

世界文学中现代小说两种形式的三重关系研究

程曦

重庆师范大学

DOI:10.32629/mef.v9i2.19169

[摘要] 以莫雷蒂“第三维”理论与杰姆逊二维模式为框架,探讨世界文学场域中西方小说形式与民族叙事的三重互动关系。通过分析晚清小说转型、巴西现代文学实践及日本私小说发展等跨文化案例,揭示现代小说生成过程中外来形式霸权与本土文化抵抗的动态博弈。西方形式作为殖民现代性的产物,兼具民族叙事基因与普世化霸权的双重性;民族形式通过叙述声音建构的“第三维”,在对抗、协商与转化三个层面实现文化主体性突围;形式选择本质上是全球化时代文化权力的镜像,而第三维的创造性转化则为非西方文学提供了突破“承认政治”困境的可能路径。可以看出,文学形式的动态协商既是文化权力的角力场,也是世界文学创新发展的内在驱动力。

[关键词] 莫雷蒂;《世界文学猜想》;杰姆逊;第三维

中图分类号: I1 **文献标识码:** A

A Study of the Triple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Forms of the Modern Novel in World Literature

Xi Cheng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Framed by Moretti's theory of the "third dimension" and Jameson's two-dimensional model,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tripl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Western novelistic forms and national narratives within the world literary field. By analyzing cross-cultural cases such a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late Qing novel, modern Brazilian literary practic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Japanese I-novel, this study reveals the dynamic game between foreign formal hegemony and indigenous cultural resistance in the genesis of the modern novel. The Western form, as a product of colonial modernity, possesses the duality of carrying national narrative genes while aspiring to universal hegemony. The national form, through the "third dimension" constructed by narrative voice, achieves a breakthrough in cultural subjectivity across three levels: resistance, negoti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Ultimately, the choice of form is a mirror of cultural power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hird dimension" offers a potential path for non-Western literatures to transcend the dilemmas of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dynamic negotiation of literary form is not only an arena for cultural power struggles but also an intrinsic driving force for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world literature.

[Key words] Moretti; "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 Jameson; The Third Dimension

大航海时代的来临推进了世界在地理意义上的连接,同时它也带来了文化上的交融。在莫雷蒂的观念当中,现代小说正是世界文学发展的产物,他认同杰姆逊所说,“现代小说的产生并非是一个自主发展的过程,而是两种因素融合的结果——西方形式的影响和当地生活的素材”,这一说法直指世界文学动态发展当中的源文化与目标文化之间的融合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融合过程并非总是顺利,因此莫雷蒂进一步提出了小说中的第三维,即当地的叙述声音,第三维的存在昭示出现代小说中的两种形式之间对抗、协商与转化的三重关系。不可忽视的是,全球化背景下的权力并不平衡,小说形式选择是文化主体性的战场,形

式博弈正是文化权力的镜像。

1 形式是主体性存在的一种方式

“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世界文学是一个复杂的场域,不同文学之间频繁地互动交融。形式选择作为主体性存在的文化语法,在西方现代性的全球播散中呈现出深刻的辩证性^[2]。西方小说形式并非中立的艺术容器,而是承载着福柯式知识权力网络的规训装置,形式霸权通过文学现代性的制度化完成其暴力编码^[3]。

1.1 西方形式的双重性质:民族叙事与普世霸权

针对世界文学中的小说发展趋势，杰姆逊曾经提出了一个二维模式用以概括，“现代小说的产生并非一个自主发展的过程，而是两种因素融合的结果”，文学发展以融合为趋势，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文学介入是不对称的，“源文学通常是肆无忌惮地介入目标文学”，也就是说，尽管同处于一个世界文学的体系当中，但文化所处的不同位置背后暗含了权力的因素，处于中心地位的源文学并不以进入边缘文化为目标，但它们总能够强势介入其生活，对其文学造成深刻的影响。而杰姆逊提出的这一模式正是针对边缘地区文化的研究，由于大规模的西方翻译作品浪潮的兴起，边缘地区文化逐渐走向与源文学的融合，源文学对目标文学的介入总是以“将外国的情节布局与当地的人物形象相融合”为主要方式，也就是外来形式与本地内容的结合。

在这一模式当中不难看出外来形式的重要地位，西方小说形式自18世纪以来逐渐成为世界文学的主流范式，其本质始终包裹着深刻的悖论：它既是欧洲文化基因孕育的在地性文字实践，又借助殖民与现代性话语被塑造为“现代小说”的普世标准，这种双重性如同硬币的两面，既无法割裂，又彼此角力。从历史的维度看，西方形式深深扎根于欧洲文明的土壤当中，无论是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建构的资本主义虚幻的寓言还是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整合社会图景，折射出启蒙理性对叙事的规训，这些形式特质并非中立的工具，而是承载着西方由来已久的个体主义认知以及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文化密码，正如巴赫金所言，西方小说具有“复调”本质，其形式本身即是民族精神的体现。然而，当这种在地性形式与殖民权力共谋时，其特殊性便被悄然置换为普世性霸权。

1.2 民族形式的主体性建构

莫雷蒂在二维模式基础上提出了现代小说当中的第三维——当地的形式，具体而言就是当地的叙述声音，实际上，在杰姆逊用二维模式分析日本现代小说时就已发现其中存在着弊端，当外国情节布局进入本地语境时，本地素材常常无法与其完全契合，导致了显著的张力或不协调，“日本社会经验的原始材料与西方小说建构的抽象形态模式之间无法实现无缝接合”。

二维之间出现的显著“裂缝”正是第三维的诞生之地，它超越了传统的二元框架，承担起解释、评价和调节两者关系的功能，也就是说第三维的存在能够调节外来形式与本地内容的张力，在外来情节布局和本地素材内容的冲突中，叙述声音充当“中介”，通过隐含评价、视角转换等方式进行调和或反驳。仍然以晚清小说为例，外国形式带来了新叙事模式，而本地内容承载了深厚的文化传统。在二者难以完全契合的空白地带，叙述声音出现填补了形式与内容间的张力空间，并成为小说文化表达的独特维度。

较为经典的例证就是近代巴西小说的创作，巴西小说特别是在殖民后期和现代化初期，通过叙述声音展现了民族文学的主体性。巴西文学深受欧洲小说影响，尤其是法国现实主义和英国维多利亚小说，这些外来形式为巴西小说提供了叙事框架，比如被誉为巴西历史上最伟大的作家马查多·德·阿西斯在《布

拉斯·库巴斯的死后回忆录》中采用西方叙事技术，以逝者的眼光为视角展开了非线性叙述，而其内容植根于殖民地经验，强调种族关系、地方社会结构和经济剥削等现实问题，在这本书当中，马查多聚焦于里约热内卢的社会等级和奴隶制的历史遗留问题，表现了殖民地社会的复杂性。作为第三维，当地的叙述声音嵌入地方文化的语言、观念和风俗，塑造了独特的民族文学身份，马查多是巴西文学史上卓越的语言学大师，在《回忆录》当中他多使用巴西口语与地方比喻，塑造了特有的叙事风格，让叙述者成为一种既内在又疏离的观察者，展示了巴西社会的复杂性，更为重要的是第三维以叙述声音的形式，塑造了巴西文学的独特性，使其在全球文学体系中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

2 树与浪的辩证法：形式博弈的三重剧场——对抗·协商·转化

2.1 浪的推进：权力支配与文化抵抗

2.1.1 浪的霸权：外来形式的权力支配逻辑

弗朗哥·莫雷蒂以“浪”隐喻世界文学中强势文化的扩张机制，揭示出外来形式如何通过系统性权力运作覆盖地方文学传统。这种“浪”的推进首先依赖于物理空间与符号空间的双重连贯性：殖民时期的印刷资本主义打破地域屏障，后殖民时代的教育体系与出版市场则进一步巩固其霸权。这种权力支配在叙事层面直接表现为叙述声音的殖民化。以20世纪初中国小说转型为例，鲁迅《狂人日记》虽保留文言楔子作为本土基因的残留，但其主体叙事已嵌入西方启蒙话语的“狂人-医生”二元结构，当传统说书人的全知视角被西方限制视角取代时，本土文化解释世界的逻辑便丧失话语权。更隐蔽的压迫在于形式与意义的解构：奈保尔《大河湾》中非洲口述传统被转化为欧洲理性主义的注释脚注，第三维的集体记忆沦为被解剖的“文化标本”。

2.1.2 暗流的抵抗：第三维的文化主体性重建

面对“浪”的压制，地方文学并未完全沦为被规训的客体，而是通过形式的博弈建构自身的文化主体性。这种抵抗首先表现为叙事结构的本土化改造：莫言《生死疲劳》将佛教轮回观转化为章节循环结构，以“驴-牛-猪-狗-猴”的动物视角消解西方单一主人公成长范式。第三维通过对外来形式的“误读”与“重写”，在浪的缝隙中开辟出文化再生的空间。莫雷蒂的“浪的推进”理论揭示了文化权力不平等的结构困境，但第三维的抵抗实践证明：地方文学从未停止在浪的挤压下寻找自己的海岸线。第三维以其坚韧的文化自觉，将“浪的霸权”转化为“潮间带的生态重组”。

2.2 树的生长：双向改造中的形式协商

2.2.1 根的困境：地域性作为文化基因的镣铐与基石

莫雷蒂以“树”隐喻民族文学的生成机制，其根系深扎于特定地理与历史经验的土壤——日本私小说的“物哀”美学依附于岛国的封闭性与无常观，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神奇现实”源于殖民创伤与热带雨林生态的交叠。印度英语写作的困境恰是典型例证：拉什迪《午夜之子》试图用印度史诗的“轮回结构”包裹西方魔幻现实主义技法，却因本土文化纵向断裂与横向分

裂陷入叙事失焦，小说中“午夜之子联盟”的溃散隐喻着第三维调节功能的失效——当叙述声音在马拉地语歌谣、乌尔都语谚语与英语思辨之间来回切换时，印度文化的整体性被解构为“异国情调拼盘”，反而强化了西方读者对东方的简化认知。

2.2.2 枝的分裂：传统与现代的叙事角力与调和实验

“树”的纵向分叉集中体现为本土文化内部传统基因与现代性诉求的对抗。帕慕克在《纯真博物馆》中面临双重压力：既要继承奥斯曼细密画的“非线性时间观”，又需适配欧洲现代小说的个体心理叙事。而在横向维度，本土文化的多元分支更易引发叙述声音的自我消解。莫言《蛙》的创作困境揭示了中国乡村叙事的复杂性：计划生育政策、民间蛙神崇拜、家族伦理构成三重文化根系，叙述者“蝌蚪”不得不在书信体、戏剧与散文间跳跃切换。这种形式的分裂看似拓展了叙事空间，实则暴露了第三维整合能力的匮乏——当本土文化的多元性超出单一形式承载力时，文本可能沦为“文化症状的陈列馆”而非意义的生产场域。

2.2.3 林的共生：混杂性作为第三维的突围路径

面对“树”的内部分裂，第三维的激活有赖于将文化矛盾转化为形式创新的动力。奈保尔《抵达之谜》提供了一种范式：将英国庄园的风景书写与特立尼达的殖民记忆杂交，通过“凝视的错位”制造叙事张力——当印度裔移民用普鲁斯特式的绵长句子描述英格兰灌木时，语言本身成为文化协商的战场。莫雷蒂的“树”隐喻揭示了本土文化在全球化中的结构性困境，但文学史的辩证法始终在证明：裂痕本身可以成为新形式萌芽的缝隙。第三维重新定义形式协商的可能——它不是树与浪的简单妥协，而是在文化根系断裂处，生长出超越地域性与普遍性对立的“新年轮”。

3 结语

在全球化语境下，现代小说的形式嬗变已然成为文化权力关系的微观缩影。西方形式借助殖民现代性的传播逻辑，以普世化叙事范式对非西方文学形成隐性规训，而民族叙事则通过莫

雷蒂所言的“第三维”——本土叙述声音，在对抗、协商与转化的三重博弈中坚守文化主体性。从晚清小说对西方叙事框架的创造性改写，到巴西现代文学对欧洲现实主义的本土化突围，再到日本私小说在东西方美学间的平衡实践，这些跨文化案例共同印证：文学形式从来不是中立的艺术载体，而是承载着历史记忆、文化基因与权力诉求的意义场域。

第三维的存在，打破了杰姆逊二维模式中源文化与目标文化的二元对立困境，它既非对西方形式的盲目排斥，也非对本土传统的固守不前，而是以创造性转化为路径，在文化矛盾的裂缝中孕育新的叙事可能。这种动态协商不仅让非西方文学摆脱了“承认政治”的被动处境，更以混杂性、在地性的形式创新丰富了世界文学的多元生态。从马查多·德·阿西斯的语言实验到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探索，第三维的持续在场彰显了文学形式作为文化抵抗与身份建构的核心力量。

归根结底，现代小说的形式博弈本质上是全球化时代文化平等对话的生动实践。它启示我们：世界文学的发展并非单一范式的扩张，而是不同文化在相互碰撞中彼此成就的过程。唯有尊重每一种文化的主体性，激活第三维的创造性潜能，才能让文学真正超越地域与权力的边界，成为人类共通经验的精神载体，推动世界文学在多元共生中实现持续自我革新与发展。

[参考文献]

[1]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集[M].中央编译出版社,2024.06.125.

[2]贺昌盛,蒋满凤.“小说”何以呈现“现代”世界“总体性”[J].探索与争鸣,2020,(10):140-147+160.

[3]林晓霞.世界文学与中国现代小说(英文)[J].国际比较文学(中英文),2020,3(02):318-334.

作者简介:

程曦(2001—),女,汉族,四川省南充市人,研究生在读,重庆师范大学,研究方向:文艺学。